

● 白 原 著

白 原 诗 选

⑧ 新纪元作家文丛

中国文联出版社

白原诗选

白 原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原诗选/白 原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7
(新纪元作家文丛/冷克明主编)

ISBN7-5059-3388-4

I. 白… II. 白…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9406 号

书 名	白原诗选
作 者	白 原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刁小林 尹龙元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1
印 数	0001-2000 册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388-4/I·2577
定 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诗

思

许多美丽的珍奇的思绪，
常常涌动在我心灵的泉眼，
如同淙淙的泉水，
流过芳草萋萋的溪涧，
伴着轻风温柔的步履，
问我为什么不歌唱？

1982年4月22日，北京

自序

一九一四年十月十日，我出生在广东合浦县黄鹂窝村（现属广西）。一九二五年春天，我满了十岁。那时在广州的父亲写信让家里把我送到他那里去。家里托人把我带到北海市，再从那里托人把我带去广州。那个春天的早晨，我跟随一个去广州经商的商人乘上一艘去广州的海轮。大概是为了节省旅费，他买的船票是比较便宜的甲板上的铺位。这是一艘载客又载货的海轮，甲板上除了载客的铺位，还装载了许多猪、鸡、鱼、虾和北海市生产的各种各样的海味。轮船在大海上航行了一天，夜里遇上了大风，狂风巨浪在茫茫的大海上翻卷。颠簸的轮船像失去控制的秋千，当船身一会向左、一会向右倾侧的时候，装载在轮

船甲板上的猪嗷嗷叫着同猪笼一起一会骨碌碌滚到左边，一会滚到右边。大风大浪继续到第二天早上。船上的乘客都晕船了，一个个都在呕吐，只有我这个小小孩不知道为什么不晕船。躺在我周围因为晕船爬不起来的乘客就让我帮他们取递衣物和用具。我这个从未见过世面的穷乡僻壤的小孩，第一次没有亲人的照顾离开家乡就在漂洋过海中遇到这样的狂风巨浪，不知道将要迎接他的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

我到了广州，正是中国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的时候。广东是大革命的根据地。革命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在“五·一”国际劳动节、黄花岗烈士纪念日或其他革命纪念日，向帝国主义或国内军阀举行抗议、示威游行，或者庆祝革命军在前线胜利的时候，就举行群众大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打着横幅标语，举着各个团体、各个单位的旗帜，敲锣打鼓，沿路撒传单，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从马路上走过。在夜里还常常提灯游行。人们提着无数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灯笼，在激荡起伏的歌声中，沿着马路蜿蜒游行，游行队伍像彩灯人潮组成的长

龙，走了很久也没有走完。

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天，正当大革命将要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政变，从四月十二日开始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接着从十五日开始也在广州大肆逮捕、屠杀革命人民。一批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押赴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这年的十二月十一日，广州爆发了革命武装起义。这一天是个星期天。那时候，我在广州郊外的执信中学附小上学。天快亮的时候，一个住在学校的老师从宿舍的过道走来，一边急敲我们几个星期六没有回家的同学的房门，一边叫我们赶快起来。等我们起来穿上衣服走到宿舍外面一看，学校里到处是穿军装的士兵，其中还有不少我们从未见过的女兵。每个士兵的臂膀上佩戴着一圈红布条。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驻扎在广州郊区沙河镇的“教导团”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后，从沙河开进广州市内的途中在我们学校停留。天亮以后，一些士兵在学校的院墙上贴起一幅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一些士兵在向学校职工、学生散发传单。一个穿大褂

的像学生模样的青年向围在他周围的人们演说，告诉他们广州的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已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号召他们参加起义的群众队伍。我们几个留在学校的小学同学围绕在那些女兵周围。她们一个个拉着我们的手问我们每个人几岁，家在哪里，上几年级，还对我们说：“你们长大了也来参加革命的队伍。”

我们一个个回答她们，感到他们那么亲切又那么神气。过了两个来钟头，起义的部队就离开了学校。这时候，广州市内正响着远远近近的阵阵枪声……

这时候，从学校到市内的道路因为战斗封锁不能通行。等到第二天道路可以通行的时候，老师就让我们各自回家。我在广州没有家。（我从家乡到广州不久，父亲就因为找工作离开了广州。）我只好回到市内一个同乡家里。

在广州起义的第二天，市内各个地方的战斗枪声越来越密。听人们说珠江上从沙面（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广州的租界）开来了帝国主义的军舰。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在帝国主义的配合和支持下向起义部队和武装群众大举猖狂进攻。起义部队和革命群众英勇战斗了一天一夜，终于因为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在第

三天(十三日)陆续撤出了广州。

过了几天,我从市内回学校去取衣服和铺盖。市内虽然比较平静了,但公共汽车仍未通行。当我走到惠爱东路(现在叫中山三路)离东较场不远的地方,一列队伍正从东较场内走到马路上向我迎面走来。走在队伍前面的国民党军队举着的横幅上写着“向共产党复仇”的标语。在国民党军队后面,走在最前列的五个苏联同志被反绑着双手,面无惧色,气宇轩昂,脚上穿着翻皮短筒靴“刮刮”地走着。在他们后面被反绑着双手走着的是一队雄纠纠气昂昂的中国同志。东较场是驻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地方。起义部队撤离广州时,参加起义的苏联同志因为来不及随部队撤退,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中国同志一起关在东较场的营房里。起义部队撤离广州后,国民党反动派将这些起义英烈捆绑起来,逼着他们在广州市内游街示众,然后押赴刑场去枪决。

从一九二五年以广东为根据地的中国大革命到一九二七年的广州起义,在我童年的岁月里,留下一幅幅终生难忘的景象。

小学毕业、上中学以后,我开始由少年逐渐进入青年时期。许多纷乱的思想,扑朔迷离的感情,开始

在心灵中萌发,在生命里骚动,并且开始在人生的道路上寻求思想和感情的寄托。于是我开始在课外阅读文学作品。第一次读《离骚》时,我一个字一个字查《辞源》,好不容易才把它读完。那时候,在我初步接触到的不多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除了《离骚》,我还喜欢杜甫、李白、白居易的诗和李清照、李后主、苏轼、辛弃疾的词。在我那时读过的中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我喜欢普希金的诗和小说,还特别喜欢泰戈尔的诗。在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我喜欢朱自清的散文,冰心的诗,尤其喜爱鲁迅的作品。我对鲁迅的作品有一种特别喜爱的感情,除了作品本身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九二七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时候,我在学校或在各种场合的人们当中,都听到他们把鲁迅作为一个十分令人钦敬的人物来传颂,从此在我少年的心里久久埋藏着对鲁迅的敬仰。后来在阅读他的作品时,虽然由于我的生活经历太浅,有一些作品(尤其是杂文)我还不完全能看懂,但我从他的作品中能真切触及到他的伟大的灵魂。我从他的作品中找到了解答人生问题的钥匙,使我那时的人生找到一种坚韧的寄托,并且为我倾注了一种刚直不阿的生命力量。以后,我又在中国的文坛上看

到鲁迅受着来自各个方面、各种人物的谩骂、侮辱和围攻，同时受着国民党反动派杀气腾腾的追踪和迫害。鲁迅却毫不含糊，毫不屈服，为在黑暗中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用他的笔同各种各样的敌人战斗不息，贡献了他的一生。由于从小时候对鲁迅的敬仰，以及后来喜爱而反复阅读他的作品，使我一生都受到他的影响。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由于青年时期的许多思想、感情没有寄托；由于在充满忧患的社会和危难的国土上感到迷惘，感到没有出路；许多人生和社会的问题需要认识 and 解答；由于人生的道路需要探索和寻找；我除了在课外阅读中国和外国文学作品，同时阅读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哲学家的哲学著作，并且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著作。我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倾向在一种还是很模糊的认识中逐步形成。这时候，我阅读的文学作品已经比在初中时广泛得多，除了继续悉心阅读鲁迅的作品，还广泛阅读中国左翼作家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文翻译的外国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浮士德》和《少年维特

的烦恼》，我特别喜爱的海涅的诗和安徒生的童话，拜伦、雪莱、席勒的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莫泊桑、契诃夫、萧伯纳的小说，涅克拉索夫、斐多菲的诗，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以及其他许多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我都买来阅读。中国的唐诗、宋词以及其他古典诗词我都广泛阅读。我所阅读的中外作家的作品，对我的思想和诗的写作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九三五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向全国发展。我们学校一个同学寒假期间去北平探亲，从北平的大学里带回一些“一二·九”运动的文件和传单。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商量，分头用刻版和蜡纸刻写，用油印机印出来，在学校开学之前趁教室没有人的时候将文件和传单放到一些课桌的抽屉里去，发动同学响应“一二·九”运动的号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第二年春天，为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广州学生举行轰轰烈烈的大游行。广州的学生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组织领导下蓬蓬勃勃发展起来。我作为我们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秘密集会，讨论、决定运动的部署和各

项具体工作的安排。

四月间的一天上午，我到一条小街的秘密工作机关去领取发给学校秘密组织的油印文件和传单。几个秘密把守在屋里的国民党便衣特务一下扑上来将我逮捕，把我带到警察派出所，然后用一辆黑色囚车把我押送到广州市公安局内的监牢里。一进监牢的铁门内，从一间间排列在走廊的牢门里就看见好些同我一起秘密做学生运动工作的学生。他们比我早几天就被抓进来，看见我被抓进来时一起抓着牢房的铁门栅往外看，并且不约而同地一起唱起救亡歌曲来，先是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然后是《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我被关进牢房以后，各个牢房的学生还在一遍又一遍地唱救亡歌曲，歌声在整个监牢内荡漾，就像一起在牢房里向国民党政府示威。监牢里也没有人制止。我在牢房里定了定神，听见各个牢房里一遍又一遍地唱着的激越嘹亮的歌声，感到无比兴奋，转身抓着牢房的铁门栅同他们一起激动地唱起来。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我们在关禁我们的监牢里放声歌唱……

在狱中被关了一个多月。我父亲去香港找我的

一个舅父通过广东省政府的关系将我营救出狱。出狱后，我上的知用中学已把我开除学籍。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在这年秋天从广州到桂林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学习，在广西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继续参加学生救亡活动。到了冬天，随广西大学学生救亡宣传队到作为抗日前线的广西钦州、防城沿海地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第二年春天，宣传队回到桂林。这年十月，我写了第一首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歌颂祖国瑰丽的大地、纯朴的人民，抒发无限热爱祖国和人民的诗《祖国啊……》用“逢美”的署名发表在桂林十月出版的《救亡日报》上。

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三八年除夕，我同爱人兰楠和几个在战火硝烟中走到一起的男女青年从桂林徒步前往延安。一路上写了《路》、《牛车队》、《骆驼》、《长途》、《风雨的道路》、《静夜里的溪流》、《思念》等诗。《路》和《牛车队》到延安后寄给在桂林出版的《诗创作》杂志，一九四二年第十一期用“逢美”的署名发表。《思念》发表在山西出版的《西线文艺》杂志上（署名“逢美”）。

由于国民党军警对去延安道路的封锁，也由于各种原因的耽搁，一九四〇年一月四日才到达延安。

到达延安后，进陕北公学学习三个月，结业后进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文学系，一边学习一边进行诗歌创作。四月，写了第一首歌颂延安生活的诗《延安》。五月，写了延安“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节日抒情诗《五月的太阳》，发表在鲁艺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出版的《草叶》杂志第三期上。十月写的《秋天的道路》用“逢美”的署名发表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日延安出版的《新诗歌》杂志上。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写的长诗《诞生》的序诗《中国！我呼唤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下半年的文艺副刊上，并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日发表在重庆出版的《文艺阵地》第七卷第三期上(署名逢美)；长诗的《一幅古老的图画》发表在鲁艺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出版的《草叶》杂志第二期上，并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三十日发表在重庆出版的《文艺阵地》第七卷第二期上(署名逢美)。

一九四四年七月由鲁艺调到《解放日报》当文艺编辑。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三月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六月随党中央调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干部队伍去太行山晋冀鲁豫解放区，先后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华北解放区当《人民日报》、新华社华北

总分社编辑。一九四七年十月参加农村土地改革工作。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二月随《人民日报》的干部队伍进北平。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同党中央领导同志进北平。我在当天写了一首欢迎他的诗《这一天》（发表在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追忆往昔人民的苦难和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抒发迎接胜利的欢欣鼓舞的情怀。

从此，我一直在《人民日报》当文艺编辑、记者，到全国各地采访，写通讯、散文、报告文学作品，同时写诗。

一九五一年七月，我的诗集《“十月”》在北京出版，收入的十五首诗差不多都是在延安写的，其中十四首收入现在这本诗选内。

广州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是一个难忘的地方。我在这里度过少年、青年时的岁月。在这里看到中国大革命、广州起义的难忘情景。革命胜利后我几次回到广州，看见少年、青年时生活过的地方以及今昔的变迁，思绪万千。为了寄托长久难忘的感情，我写了一首《返广州》的诗，发表在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的

《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

在我青年时期的一段生活经历中，桂林也是一个难忘的地方。革命胜利后，一九五七年春天我去那里采访。它的奇丽的山水，生活的风情，引起我对青年时这段生活的深深的思恋和无限的怀念。我在那里写了《你好啊，桂林》、《寄华子》、《桂林即景》、《桂林——大地的画卷》、《榕湖和杉湖》、《漓江呀，漓江……》。《桂林即景》、《榕湖和杉湖》发表在北京《人民文学》杂志上。《桂林——大地的画卷》发表在天津《新港》杂志上。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我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当编辑。由于对诗歌的形式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我开始尝试借鉴旧体诗词和民歌的形式和韵律，同时不受旧体裁和格律的束缚和限制，用现代的语言，自由的体裁和韵律，写一种具有民族传统风格和韵味的表现现代生活的自由格律诗。这就是我开始写《暮归》以后所写的二三十首这种民族传统风格的诗。这些诗差不多全都用“李村”的署名发表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虽然曾经受到部分文艺界人士和读者的注意，但后来我没有继续写下去，仍然写“五四”以来开创的白话诗。原因是我觉得这样一种尝试虽然可以